

日本侵華內幕(七)

森島守人著。陳鵬仁摘譯

傀儡政權陸續降世

因爲日本出兵華北，事態正在日趨擴大時，八月八日佔領北京的次日，事態已擴展到上海，已激發中國決定全面抗戰。在這期間，日本政府先是拒絕英國之斡旋提議，嗣因德國駐華大使陶德曼的斡旋，日方與中國政府開始交涉，又沒有結果；延至翌年一月十六日，日本政府却發表了「不以國民政府爲對手」的歷史性聲明。關於這個經過，對日方在華北的諸機關，政府並沒有提供任何情報，對於收拾時局的方法，也沒有任何指示；而在這期間，撤開中央，當地軍部却積極地進行華北五省的自治，陰謀促其由中央分離。

軍事衝突延伸華中

在中國，因爲發生事件，地方行政機關停頓時，向來由地方的實力者成立維持治安的組織，這是屢見不鮮的例子；蘆溝橋事件以後的北京也沒有例外，以曾任清朝時代國務總理的江朝宗爲委員長，組織維持治安會。惟這種機構在其性質上免不了是臨時的；可是隨日軍佔領的拖延，而

需要具有比較長久性質的機構，於是河北省行政機關的問題，便首先被考慮。

在這個時機，組織華北五省政府的問題引起人們的注目，與此同時，並討論建立「中華民國臨時政府」。有的人主張事件既然擴延到華中方面，自不能以華北五省的自治爲滿足，而應該在華北組織一個在日本庇護下的中央政府，而將來它亦當包括華中。

對此我認爲，就是使用「臨時」這兩個字，太早組織類似中央政府的機構，將爲未來中日國交的全面調整帶來累贅，這些既成事實將牽制日本政府；因此最好能避免有中央政府這種明確的輪廓和名稱的機構。對於自古以來「易姓革命」，亦即一失德，主權者就應當更換，以及鼓腹擊壤，以天天能安居樂業爲德政的一般中國民衆來講，成立中央政府，算不了什麼；不如就近組織省政府，給予生活的安定，這是修正行政機構的近道，所以我主張成立「河北省政府」。

我向外務省建議了上述的意見，並在北京與軍部折衝；但在中央還沒決定方針之前，當地却於十二月中旬，成立了以王克敏爲首長的所謂「

中華民國臨時政府」，它包括了王揖唐、朱深、齊燮元、湯爾和等老政客和武將，但沒有一個能吸引現代青年的人。到了要舉行臨時政府成立典禮的前一天晚上，外務省纔來應該避免「中央政府」之型態的電令；但箭已離弦，對於當地軍部的方針，已無可奈何。在另一方面，以華中駐屯軍爲中心，在上海也有樹立中央政府的空氣；而臨時政府的成立，與不以國民政府爲對手的日本政府的方針，綁住了日本政府的手脚；而成日方爲處理將來中日關係之無法自拔的一大障礙。

設立銀行維持通貨

在行文上，自應繼而談到華中方面的政權工作；惟在臨時政府之下所設的聯合準備銀行，對於日本的對外關係，遠比臨時政府的成立，給予更大的不良影響；所以我想在這裡就作個說明。

聯合準備銀行創建於一九三八年二月，發行新銀行券，不過最初並沒有這樣明確的構想；惟因蘆溝橋事件後，北京市內極端缺乏貨幣，纔開始這樣做的。事變擴大以後，北京市內的鈔票突然大爲減少，因而竟影響到外國駐屯軍的購買力

，因此各國的大公使館，便再三喚起我們的注意。

中國銀行的北京分行依靠天津的分行，天津分行依存上海的總行；而由於北京、天津間與天津、上海間的斷絕交通，無法外運現款。而且其總行似乎故意要困擾日軍，因此一發生事變，據說就把京津方面的鈔票收回，而造成北京通貨不足。

與此同時，對於事變的發展性，日方沒有明確的推測，所以還未決心要發行軍票。很早以前就在流通的正金銀行鈔票，自幣制改革以來便不見其踪跡，因而對於通貨的不足，亟需講究某種善後對策。此時，企畫院次長青木一男，特別銜命前來當地考察，並處理通貨問題。

本來在中國，能够發行銀行券的祇有中國、中央、交通及農民四個銀行；而在華北，惟有河北省銀行是例外，可以發行銀行券。河北省銀行的銀準備雖然不十分足夠，但它却擁有很多的不動產；因此我對青木建議，密封相當金額的朝鮮銀行券，原封不動地由河北省銀行保管，以此作為抵押，令其增加發行鈔票，才是實際可行之良策。

青木完全贊成我的意見；可是他回國以後，日本政府所決定的，竟是所謂「聯合準備銀行」這個華北之新中央銀行的創立案。我對於其詳細的來龍去脈，不得而知。不過由阪谷希一在滿洲參與新中央銀行的創立和新鈔票的發行，以及其擔任華北駐屯軍的財政顧問這個事實來判斷，可能滿洲集團的意見左右了日本政府和日軍所導致

。但是，在滿洲發行新鈔票之所以獲得成功，實有其相當的理由；我們不能即時全盤地搬到華北。新銀行之所以在滿洲成功，是因為張作霖父子兩代濫發行奉天票，結果奉天票失去了一般的信用；朝鮮銀行券以日本的國力為後盾，廣泛地流通，獲得中國民衆的信賴和親切感；東三省長年成為特殊地域，流通着跟中國本部不同的鈔票；不像租界有外國勢力存在的地區等等原因，在華北，却毫無這種現象。沒有考慮到此種根本上的差異，祇看其在滿洲的經過，就相信華北也可行，這是其造成錯誤的最大原因。

認識和調查的不足，不僅如上所述，且因發行新鈔票，華北在金融上與中國本部分離，形成獨立的地域，所以華中與華南之間物資的流通，需要新的清帳；惟由於華北一直是必須由華南運進糧食，因此經常處於透支亦即「入超」的狀態。又以往透過天津所作之蒙疆地方皮革類的輸出，因為滿洲國的成立和日本的蒙疆獨立政策，而從經由天津改變為經由奉天和大連；華北的外匯，因之而減少。由於沒有考慮到這些事實，臨時政府得每年補墊幾千萬元的收入不足；為了經濟的自立，不得不實行輸出、入的統制，和管理外匯。結果嚴重地侵害了外國的權益。

抬出要人壞蛋一個

上海陸軍特務部的原田熊吉少將和楠本上校，常常跟北平聯絡，並準備在華中先組織省政府，然後令北方的臨時政府吸收它。判斷中國被分

割之不利的北方王克敏，特地在政府的名稱加上臨時兩個字，表示這不是永久的存在；同時在機構的實體上，空着重要的位子，以留延攬人才的餘地。但在實際上，他的用意是聯絡居住上海的安福系政客梁鴻志一派，以梁為內政部長；暗中交涉，要廉隅出任成立維新政府後的外交部長。

對於北方的這種動態，首先表示反對的是南方的軍司令官松井（石根）上將，他於一九三八年元月號的「改造」雜誌發表其見解說：「要在華北組織中央政府，實在太不懂得中國，中央政府應該設在控制長江的華中，否則不可能根本解決中國問題。」繼而別於原田、楠本的特務部，另行設立機構，由白田寬三、長勇兩個上校受司令官之意，從事工作；而在中國方面突然冒出來，就是從來沒聽過其名字的怪人王子惠。

本來，在中國之所謂日本村的醫生在政界是相當活躍的。大概由於工作上的關係，日本醫生知道中國要人的個人秘密而獲得他們的信賴，因之有很廣泛的交遊；而奉天的守田福松、天津的藤田某，和上海福民醫院院長頓宮某就是其犖犖大者。正在苦於找不到「要人」的白田和長勇，因為頓宮的介紹與王子惠會面；王子惠五官端正，能言善道，好像很有魅力，因此一見如故，獲得白田和長勇的欣賞。

他們兩個人遂推薦王子惠，往見司令官松井，松井贊成抬出王子惠；作為中國通之司令官松井其所以同意起用王子惠，似非看中其人物，而說是王子惠與蔣先生有聯絡。可是，由於總領事館之副領事岩井英一的努力，獲悉王子惠是出身

臺灣，第一次上海事變後，天長節（日皇誕生節日——譯者）紀念會席上發生炸彈事件（譯註一）時，說要引路幫忙找真犯人，而誘騙陸海軍，出動驅逐艦到吳淞的王晦知。

於是，中日雙方反對王子惠的聲勢日漸高漲；陷於困境的白田和長勇，爲了消滅反對王子惠的勢力，便從神樂坂和淺草糾合許多流氓，訴諸於謀略和暴力手段。這些傢伙在日本村，橫行濶步，肆無忌憚，脅迫威嚇，毆打殺人，無所不爲；對於原田和楠本，甚至於得派憲兵予以保護。帶頭的某人是個性格變態者，據說，他把中國人的鼻首排在他自己房間，浸在剛洗血的澡盆而自悅。

二次大戰後，從上海回國的山田純三郎，可以說是無人不曉的中國通，他跟國民黨西山派的關係很深，在孫文時代，就奔走革命。他也非常反對起用王子惠；有一天晚上，說是要請教他有關新政權工作的意見，因而邀他前往新安旅館；山田老一到旅館，便被擁護王子惠的一夥軟禁起來，責問山田之反對王子惠，用手槍和武士刀威脅，終於騙得山田支持王子惠的字據。山田在上海談到這件事時，曾經回憶說，這是他長年生活在中國最大的失策。

設計中國維新政府

在很重視排場、經歷和面子的中國，沒人願意充當無名的騙子王子惠之部下是不言而喻的；所以最後由梁鴻志出任行政院長，於三月底在南京成立「中華民國維新政府」；因此在中國的南

北，同時產生了以日本陸軍爲後盾的兩個中央政府，這實在是不可思議的現象。

王克敏對於上述北京的內部情形，都逐一得有情報，惟在成立維新政府稍前，接到梁鴻志披瀝其苦衷的信說：「對不起違反事先的了解，惟因日本陸軍的壓迫，不得不馬組組織維新政府」，因此以無法瞭解日本政府和軍部的真意，突然將前述的經過寫成公文，向軍司令官提出全體閣員的辭職。狼狽尷尬的日本政府，遂以將在適當時期令臨時、維新兩政府合併組織中央政府，纔得王克敏的回心轉意。

日本政府倉惶在福岡召集當地的有關人員協議結果，發表了如下的方針：「徐州戰後，津浦線（天津、浦口間）一開通，就令臨時、維新兩政府合併。」但這不過是敷衍表面，維持中國人面子的彌縫辦法。從知道其內幕者的眼光看來，這兩個政府成立的經緯和內部情形，太過於複雜離奇，實在無從合併。

拉攏唐紹儀吳佩孚

如所逆料，日本政府於七月底從華北、華中兩特務部取消中央政權工作，另外設立所謂對華特別委員會；陸軍是土肥原，海軍爲津田靜枝預備中將，外務由與外相宇垣（一成）同期的坂西利八郎預備中將爲代表，他們三個人應該是一心同體工作的，可是津田却在上海不動；坂西忙於旅行中國各地，他很可能是爲宇垣秘密着手要與重慶直接交涉的事而活動；唯有土肥原在上海設立土肥原機關，作表面上的活動，而其目的是要

拖出國民黨的元老唐紹儀，和直隸派的猛將吳佩孚。

對於土肥原，在上海，日方各界都忠告他不要輕舉妄動，但土肥原一到上海，却就在訪唐紹儀；沒幾天，唐紹儀便在法國租界的他家裡被國民黨份子暗殺。在另一方面，隱居北京的吳佩孚早已皈依佛道，一天到晚專事念經，毫無捲土重來政界的野心；曾經被公認爲是中國軍界的第一把手，清白廉潔之模範的吳將軍，就是以救濟人民的美名，也不肯爲日本軍部的傀儡。

土肥原自信仰仗曾任滿洲國實業、外交兩個部長現又回歸中國的張燕卿（張之洞之子），便能够抬出吳佩孚；可是吳佩孚却始終不動，結果變成土肥原被張燕卿牽着鼻子走，除作了一次禮貌上的拜訪以外，跟吳佩孚毫無懇談的機會，反而竟由張燕卿在中國報紙發表所謂吳佩孚之招待外國記者的假報導，徒增吳佩孚不相信日本的信念而後已。籠絡唐紹儀、吳佩孚之工作，完全失敗了。

拿汪精衛充當傀儡

接替廣田出任外相的宇垣，透過香港總領事 中村豐一，曾努力於與孔祥熙的直接交涉；惟因軍方的阻礙，未能成功，而以設置與亞院問題的表面理由離開了內閣。於是舞臺遂移到汪精衛工作，是即一九三八年十一月，日本政府有關東亞之新秩序的聲明，乃是日本對華政策上的一個轉捩點，而這實在是以汪精衛的出馬爲其基礎的。

一九三九年夏天，首相平沼（騏一郎）將日

本派駐中國各地的各機關負責人召集於東京，決定大力推進汪政權工作的方針；其目的在於排除以往各自為政，各派駐機關的獨斷行動，由日本中央一元化樹立中央政府（傀儡政權——譯者）的工作。我們外派的外務機關之贊成前述政府的方針，從現在看來，是種短見；但在當時這是基於既沒有希望與蔣先生直接交涉，也就祇有依汪精衛的出馬與政治力量，嚴重要取得諒解，捨此實無法收拾時局的一種想法。

不過在這個階段，華北方面還有人仍不死心於抬出吳佩孚的工作。我在上海的時候，曾經接到汪精衛前往青島與臨時政府的要人商談時，北京大迫上校手下的刺客前去青島的可靠消息；我趕緊遣派副領事岩井到東京，與影佐上校合作，纔得無事；但關聯到情報的出處，在浪人之間曾經引起道義的問題，為此，他們吵鬧了一大陣子。

（譯註一）一九三二年四月二十九日，上海事變停戰交涉中，在上海新公園慶祝日皇生日典禮席上，韓國人尹奉吉投擲炸彈，公使重光葵負重傷，割掉右大腿，第三艦隊司令官野村吉三郎和上海派遣軍司令官白川義則也負重傷，不到一個月，白川死亡。

宇垣進行結交美英

在奉天和北京，與第三國關係的交涉事件並不很多；但在上海，却累積許多懸案。美國雖然堅持着自由主義和原則，但久未正式提出抗議，而採取當做地方問題，由領事去處理的方針。反

此，英國除由領事折衝外，大使館本身一一提出正式抗議。這似乎是由於美英兩國在華權益的差異；二來為許多問題是具有祇要跟英國解決，其他國家便可均霑的性質；三來表示美英兩國的密切關係。

在一方面專心於重慶工作的同時，外相宇垣以中國問題為中心，對調整跟美英的國交，作了最大的努力；而具體化的行動就是宇垣、格萊基（英國駐日大使）會談。這時英方提議長江的開放、上海共同租界北部地域的開放和黃浦江改修局的恢復原狀等問題；他們的理由是，要考驗日本尊重外國權益的誠意。

但由於當地的複雜因素，東京方面雖在主義上和原則上獲得諒解，在實際上還是都不能解決。如果要解決，非得經過中央的陸海軍和第一線之陸海軍的同意不可。事實上，在宇垣、格萊基會談紀錄中，有格萊基曾問：「所謂共同租界的北部地域指着什麼地方？」對此，宇垣外相和擔任翻譯的土屋準書記官都不知道內情；由此以觀，當可知道當地交涉不易成功。

在上海，我負責了這個交涉，而最費苦心的，不是對外周旋，而是以陸海軍為對手的對內折衝；亦即要如何使互為對立、相尅之陸海軍的利益和立場妥協與調和的問題。不僅陸海兩軍之間有對立，陸海軍本身內部的矛盾也很嚴重；尤其是陸軍，因為在當地有部隊、特務機關、憲兵隊、船舶司令部等各種機構，所以其傾軋更是厲害。

譬如上海市前面的蘇州河，以及往還其附近

之小河的中國民船，民船因為治安關係，得攜帶日方機關發給的許可證，但海軍所發的，陸軍却常常不給承認；陸軍發行的，海軍往往不予理睬，因此最受苦的，當然是無辜的中國老百姓。於是他們想出懸掛德國或義大利國旗的辦法，這樣他們可以到處去。

由於這種原因，狡猾的德義商人之中，有不少人不但借其名義，而且故作假契約，出讓船籍，不當得利，而幹此種情事者，尤多義大利人，連其官員，明知其為偽造，也要以軸心國為藉口，強行下去。這如果從日方來說，無異是放棄當然的權利。而由這小事，我們自不難推斷陸海兩軍對立的情形。

硬要開放公共租界

黃浦江江口，因為長江所流下泥土的堆積，為着航行的安全，必須經常浚淤。為了改良和保存這個水路，依義和團事變議定書，便設有所謂黃浦江改修局這個國際機構，並受外交團的監督。蘆溝橋事變後，日軍扣押了改修局的船隻、機器和設備等，改修局的機能便告完全停頓；因此，改修局的重開，對於列國成為重要的國際問題。海軍以總工程師如果用日本人，則準備同意重開，但陸軍却一直強硬反對。

蔣先生時代，曾在吳淞方面建設市政中心（civic center）的計劃，其一部分且已就緒，陸軍繼承了這個計劃，並為這地區的馬路，取了松井街、近衛街等名字；如果停止浚淤，大船舶將不能停靠共同租界的碼頭，共同租界將隨之而衰微

，共同租界的繁榮勢必為市政中心所取代，以上是陸軍的反對理由；但這是沒考慮到金融、通信、倉庫等為經濟活動所不可或缺之各種設備的外行話，他們以為祇要建設毫無這些設備的街道，就能够一舉推翻英國花費數十年所經營共同租界的現狀，簡直是癡人作夢。

結果以事變繼續中的暫時措施，使用日本人總工程師數名而妥協，但陸軍的船舶司令部，却反對到底。該司令部直屬於宇品（地名——譯者）的運輸司令部，並不隸於南京總司令部的管轄，而且由於其首腦人員很多是在陸軍內部常被視爲苦力的輜重兵出身，所以其眼界狹窄，平日的偏見使他們這樣做。

封鎖長江困擾列強

對於這個問題，陸海軍採取了跟對於改修局完全相反的立場，亦即陸軍的意見比較溫和，海軍的態度比較強硬。以上海的大門吳淞口爲界的北方地域，大體上是日本人的居住地區，當然這個地區也是共同租界的一部份，惟日本海軍陸戰隊的本部在此，加以列國在上海的共同警備計劃上，它係屬於日方的擔任區域，因此事變以後，日本海軍便從這個地區，把共同租界的警察權和一般行政權逐出，而悉數操在日本海軍手裡。

不特此，對於日本人以外的居住者海軍發給居住證明書，其他一般人的出入則發行出入（通行）許可書，因而爲中國人和外國人的日常生活帶來許多的不利和不便。尤其是吳淞口兩端步哨的身體檢查和詢問，常常亂來，所以既受到外國

人的責難，而又經常引惹不必要的摩擦。

因之，列國也就執拗地要求在這個北部地域早日恢復工部局的行政權，對一般人開放這個地區，可是日本海軍却以對於維持治安，不敢信賴工部局的能力和誠意，而不肯答應。日軍對於開放這個地區的條件，提出種種的要求，獲得租界當局同意，將任命新的日本人警視副總監和大量任用日本人警察，於是海軍又提出要加强日本人副總監的實際權限，和在北部地域配置日本人警察署長，其要求簡直是無止境。

我正式以工部局參事會議長美國人律師佛蘭克林爲對手，非正式地與美英兩國總領事等折衝，結果把以前A、B兩個警備區域分成A、B、C三個區域，其中一個配置日本人署長而妥協；可是一到劃分警備區域的時候，美英方面不肯把有許多碼頭和倉庫之沿河的地域讓給日本，尤其是北部地域曾經爲美國租界的預定地，所以爲調整列國的地方利害，真費盡了苦心。

開放長江，爲列國所最重視，但這不是祇以地方協定所能解決的問題。日本海軍以作戰上的理由反對開放，但他們的本意是想在作戰期間，確立日本人在通商上的優越地位。事實上對於第三國，說是除日本軍用船輸送軍需品以外，全部禁止一般商品的搬運；但對於日本報紙却准許其刊登有關長江上游日本船舶出發和到達時間，日本商人也公然寄送有關買賣輸往長江上游之物資的廣告和消息；因此列國之不理睬日本有關封閉長江的正式聲明，誠非偶然。

上海的美國商社秘密來說，跟滿洲一樣，蒙

疆政府也有石油專賣的計劃，並問有無什麼令雙方都能接受的辦法，因而我介入於蒙疆與美國商社之間，盡力斡旋；惟其沒有特別的妙案，所以遂令蒙疆停止了這個計劃。結果，華中的石油專賣計劃，也就隨之而沒有下文了。

我就改修局和租界問題交涉幾個月，對於解決案在大體上已經獲得同意時，美國通知要廢棄美日通商條約，我奉命調職華盛頓，因此草簽了協定案就離開了上海。

美國通知廢除商約

九一八事變的時候，美國史蒂姆遜國務卿發表不承認行使武力結果所造成之事態的聲明，這就是所謂不承認主義。這個原則是美國遠東政策的基本方針，不過滿洲國獨立之後，美國並沒有出於積極的手段，而以不得已的既成事實，默認滿洲國，採取靜觀的態度。但是，對於滿洲國的靜觀態度，是否完全適用於中國本部，自是另外一個問題。

果然，一九三七年七月，一發生盧溝橋事件，赫爾國務卿便表明美國對於國際問題的立場，提倡否定以武力執行政策，依和平的交涉調整紛爭，不干涉內政，通商上的機會均等等一連串的原則。這項聲明，並不以中日兩國爲對象的形式，而採取給列國的方式，因此無疑地這是針對華北的局勢而發的。

在各國異口同聲表示贊同的情勢中，惟獨日本政府說：「要適用上述諸原則於遠東的局勢，必須考量遠東現有的特殊狀態。」實在很值得注

視；而由此我們當可知道，重視主義和原則的美國，與着重現有事態的日本，其立場實完全不同。

同年十月初，羅斯福總統發表「國際上無秩序的傳染病必須隔離」一篇有名的隔離演說；與此同時，美國國務院聲明說，日本在中國的行動，違反了九國公約和非戰條約；在東京，格魯大使正式要求日本停止對美國各種權益的差別和妨礙。無需說，前述華北的滙兌管理、貿易的統制和長江的封閉等等，皆屬於這個範疇。

狡辯侵害外國權益

自蘆溝橋事變以來，廣田、宇垣兩個外相曾就侵害外國權益的問題辯解說：「日本政府仍然遵守門戶開放、機會均等主義，尊重九國公約的方针並沒有任何變更；惟在進行軍事行動時雖有些妨礙，但那不過是一時的和變相的事態；軍事行動一結束，就馬上會改正過來；而有田外相則從完全不同的立場來處理這個問題。」

一九三八年十一月十八日，有田外相對美國曾經回答說：「日本在東方，爲着建設基於真實國際正義的新秩序而正在作最大的努力；在東亞的天地正當展開新的情勢之際，不能以適用於事變前之局勢的觀念和原則，來衡量現在及今後的局勢。」這是東亞新秩序的宣言，也是九國公約的全面否定，更意味着日本遠東政策一百八十度的轉變；而且，對於美國重新否認新秩序的獨斷創造，建議應以同意和交涉來解決的提案，日本完全置之不理。

滿洲祇是偽國

軍部多主侵吞滿洲

發生九一八事變的最初，當地軍部並沒有具體地考慮着獨立國家案，而大多主張合併滿洲論，可是經過三、四個月以後的一九三一年年底，獨立國家案已經是關東軍的既定計劃。這時，爲就任大養內閣的外相，回國途中路經滿洲的駐法大使芳澤，在奉天停留一個星期左右，與各方面人士懇談再三，費心於追究滿洲的實情和關東軍的真意。

我對於他的詢問，曾毫無保留地答說：「獨立國家的實現，只是時間的問題，祇要用兩三支手槍威脅，就即時發出獨立宣言。獨立宣言後，預定寄給各國的對外通牒，現正在關東軍的總務課起草中，它包含尊重國際條約和國際慣例的一項，日本政府如果想阻止其獨立，捨以非常的決心抑制第一線軍部別無他途，外務省的駐外機構，實束手無策。」

我同時報告他，吉林的熙洽告訴美國總領事韓遜的話：「多門（二郎）師團長以手槍對着我的腦袋瓜威脅，因此我不得不答允吉林的獨立。」（奉天總領事館曾由某方面獲得韓遜調查旅行中所拍電報的全部抄件），以及「從東京以前的狀況判斷，政府可能沒有這種力量，頂多祇能藉口樞密院的諮詢等，以儘量拖延承認其獨立而已。」

三月革命計劃發展

現在回想起來，在三、四個月之內，從合併到新國家，轉變一百八十度，並非表面上的變化，而是繼承所謂三月革命計劃之發展的結果。重視農村的窮苦和政黨的腐敗，認爲祇有由軍部行獨裁政治以實行國內革命外，沒有救濟邦國之前途的思想，不但在日本國內的青年軍官，而且浸透到關東軍的青年軍官，更與其東京的同志有很密切的聯絡。

三月革命挫敗之後，他們便準備在滿洲起事，佔領整個滿洲，在這新天地實施軍部的革新政治，從而把它移植到日本國內。九一八事變以後，禁止資本家和財閥插足滿洲，倡導王道樂土，五族協和，無產階級政治；繼而依一國一黨思想成立協和會，出現關東軍的獨裁等經過，充分說明了這一點。

在這種意義上，九一八事變是大陸政策與國內革新兩種思想的結合，而左翼人士麻生久、淺原健三等人，與右翼的國家改造論者大川周明之有聯繫，就是由於此種原因。

換句話說：發動九一八事變的青年軍官們，既是大陸政策論者，同時也是國家社會主義者。

原來，一部份日本人，早就具有滿洲獨立的思想。爆發蘆溝橋事件的時候，訪問北平的松岡洋右曾說：「滿洲獨立是我多年來的宿望，中國第一革命之際，令北

京的公使伊集院（彥吉）建議滿洲獨立論的就是我。」其懷舊的氣勢，真不可一世。

大隈內閣時代，袁世凱稱帝之時，曾在滿洲各地，假浪人川島浪速等之手，操縱土匪，令其出動，並與蒙古巴加布的崛起互相呼應，一舉實現滿洲獨立的計劃。在日本政府承認之下，以外務省的政務局長小池張造為中心，由大倉組支付必要經費的這項計劃，因為袁世凱的突然死亡，而失去實現的機會；後來為處理這些土匪，曾傷透了腦筋。這就是所謂宗社黨事件，而據說，小池之轉進久原組，便是由於擔負這個責任而來。

又，關於這個事件的文書，早就離開外務省文書課，而藏在亞細亞局的金庫底下，所以外務省的官員之中，除與亞細亞局有關係的少數人外，恐怕沒人看過這個文件，更不可能知道它的存在。

而促進實現滿洲建國的是，一九三二年春天，李頓調查團的來到滿洲，因為在這之前，軍方要製造既成事實，為此，軍部曾策劃拖出隱遁天津的溥儀；土肥原負這使命，於一九三二年晚秋，潛赴天津。十一月，在天津發生反對張學良的暴動，在日本租界與中國街境界附近的槍砲聲中，溥儀脫出天津，進入滿洲。而扮演這個事件之主角的是從一九三二年秋季就任首任駐日代表的鮑觀澄。

鮑觀澄與土肥原的關係，起始於土肥原上任奉天市長之日；當時，鮑以政治犯正在被張學良監禁，由於土肥原釋放了政治犯，他纔獲得自由

，從此以後，他倆形影不離，同其行動。土肥原一轉任哈爾濱特務機關長，鮑便被任命為哈爾濱市長，繼而以首任代表赴日。

溥儀對日本的真意如何，自遠東國際軍事法庭以來，引起許多討論。在做皇帝之前，執政時代的溥儀，不願示作為皇帝的威容，所以也很輕鬆地跟我們促膝交談；綜合我私下跟他兩三次的會談和他親信的內幕話，溥儀不但由衷高興回滿洲，而且以為他將以大清帝國的帝王，安居北京的紫禁城；迨至就任執政後，面對因為關東軍而完全失去自由冷酷事實，纔對日本的作法不平和不滿。

滿洲走向獨立過程

關於滿洲國走向獨立的過程，由滿洲新政權人事政策的變遷，自可窺悉其一端，而滿洲國的人事，實可以大別為以滿鐵、駒井（德三）和官僚為中心的三個時代。

爆發柳條溝事件以後，張學良身邊的年輕官員都離開滿洲，舊要人們也多消聲匿跡，而為填補這個空白，滿鐵社員遂大量地走上政壇和宦海。這以地方課長中西敏憲和衛生課長金井章次為領導者的滿洲青年聯盟，與由滿鐵的笠木良明所統率的雄峯會為中心，而在正副總裁內田、江口前往東京時，由與板垣意氣相投的理事十河信二發號施令的。

大連的日文報紙「大連新聞」，為鼓吹大陸政策，曾召開過青年模擬議會，而這個議會之長久化的，就是青年聯盟，它以大力推展的日本滿

蒙政策為目的。反此，雄峯會是由滿鐵的年輕法學士和關東軍的年輕軍官中所謂革新派所組織的思想團體，其目的在於革新內外庶政；但沒經過多久，這兩個團體便開始發生爭執，青年聯盟敗退，雄峯會壟斷了滿洲國獨立前的自治指導部和獨立後的資政局，領導了建國思想的培養和普及。

青年聯盟和雄峯會的會員，一般來講，多是滿鐵內不大認真工作之大言壯語型的人，他們欠缺實務上的知識和經驗。但關東軍却不管其知識和能力，而祇尋覓衷心共鳴軍部方針者，因而找不到真正的人才。譬如派出去做副縣長長的，竟有在四平街車站賣便當者和安東洗澡堂的老板，他們有生以來第一次穿上大禮服，得意洋洋進縣城，實在可笑。事實上，滿洲政權初期的人事，跟在昔鄉下戲的頭一天一樣，先來先佔好位子，因此，滿鐵的衛生課長一躍而為奉天省的總務司長（日本的總務主管人事和經費，總務司長是首席司長——譯者），毫無司法事務經驗的醫院事務長，一跳而當司法部總務司長的例子，說來並不算稀奇。

而在這個時期來到滿洲的就是駒井德三，他後來出長首任總務長官，由於跟次官小磯（國昭）是老朋友，所以獲得陸軍的絕對支持，而在日人官員中，大有聲威無雙鶴立雞羣之概。駒井畢業札幌農科大學，在滿鐵工作很久，具有滿洲現地的許多經驗，在這期間，與當時的上尉小磯參與宗社黨事件，自此以後跟小磯成為好朋友。

九一八事變當時，外務省屬內的駒井，曾經

請求外務省將他派到滿洲，惟外務省把他當做危險人物，沒有同意，因此經由小磯的推薦，以陸軍省委任身份前往滿洲。我因為與陸軍的折衝上，常常麻煩駒井，所以認為外務省如果能度量大一點，起用駒井，或許能善導陸軍也說不定。

原來是學者而又極其謹嚴的國務總理鄭孝胥，與粗魯奔放的駒井在性格上既不相容；與此同時，以王道樂土為理想之笠木等人的革新派，很不齒於駒井之伸張日本權益的一邊倒，而與鄭孝胥勾結，以排除駒井。不久笠木派敗北，駒井又因為與對鄭的關係，由總務長官而調到滿洲國參議的閒差。

此時出現了以日本官僚為中心的第三期時代。九一八事變的興奮一冷靜，軍部便自覺新政權欠缺人才，因而起用了戚式毅、于沖漢等舊要人，經由他們推薦的優秀滿人官員也陸續復了職。至此，日本政府才認真扶植滿洲國，而由各省派出現任的官吏。我曾期待這些人能够牽制軍部的專斷作法，可是我的期待却成為泡影。他們不懂得滿洲的實際情況和滿人的風俗、習慣及心理，而徒行為意識形態所拘束的劃一行政和法規萬能的行政，把在日本國內受指責的僚屬政治搬到滿洲，由之產生了相對於「土匪」之「法匪」的新成語。

僅僅是日本衛星國

滿洲國是在「王道樂土，五族協和」的美名之下宣言獨立的。但這是個名目，實際上是十足的日本衛星國，是顧維鈞說

的所謂偽「國」。

國務總理、大臣和省長，雖然都任命滿人，但他們徒具虛名，實權完全操在總務長官和次長手裏。財政、金融、交通、產業等等，一切在日滿合作的形式之下，掌握在日本人手中。而且，總務長官以下所有日本官吏，都得甘於關東軍的願使，負責指導滿洲國的關東軍第三課，才是事實上的滿洲國政府。

而其所以造成這種局面，乃是由於滿洲國獨立之際，在司令官本庄與溥儀執政所決定的「覺書」中，關東軍司令官對於滿洲國擁有裏面指導權和人事任命權的結果。日本承認滿洲國的時候，外務省曾想在日滿之間締結正式條約，將關東軍司令官與溥儀執政的內緣關係變成正式的關係，亦即意圖把事實關係改為外交關係，將關東軍的裏面指導權和人事任命權移到日本政府手裏，但為關東軍所拒絕，而終於未能達到目的。

畢業於六高（第六高等學校的簡稱——譯者）和東大（東京大學的簡稱——譯者）的張操，曾批評日本的對華政策說：「日本的作法與日本人吃中國菜一樣；吃魚時，不但把兩邊的魚肉吃光，連魚珠，什麼也都要吃得一乾二淨，一點也不想留的話，日本的對華政策勢必日暮途窮。」

按照中國人的習慣，魚祇吃其上面，下面部份則留給廚房；傭人的家族及其朋友們，常常來大吃大喝主人留給廚房的酒菜。據說，孫中山先生旅行日本國內時，曾由火車車窗望外邊說：「耕種到山頂，可見日人之勤奮。」對這，他的隨員說：「耕種到山頂，可見日本國土之貧困。」他們

把日本人的島國根性不折不扣地反映於對滿政策上，是即獨佔慾是它最大的缺陷。

滿人怨恨用鎬殺賊

其次，我想說的是，日本之不能獲得滿人信賴的另外一個原因，是日人和朝鮮人偏狹的國家意識和優越感。九一八事變後，有如海濤往滿洲擁擠的日人、朝鮮人之中，有的夢想一攫千金，有的為優越感所驅，假軍部和國家的勢力，胡為亂作，在滿人之間引起很大的反感和憎恨。他們多認為既然在日本勢力之下，自大可以像處身國內自由行動，因此穿上浴衣，光着腳穿拖鞋在街上晃來晃去；一個盛夏黃昏，在奉天大和飯店屋頂院子，洋人在那裏納涼時刻，竟有些捲上浴衣，穿着拖鞋插足此間的日本人，而受到洋人的冷眼相看。

跟滿人爭土地、房屋的事件也隨時發生，從而招來滿人的怨恨；而在北滿佳木斯設立「內地移民村」便是其極端的一例。拓務省以北滿可能有許多無主地，所以九一八事變爆發不久，便在治安還沒確立的佳木斯方面計劃建設移民村，並送來移民團。但就是北滿，那裏來得那麼多無主地？這就需要購買既墾地，但已經在大地上生根的農民，當然不肯隨便出賣其耕地。束手無策之餘，他們便利用軍部討伐土匪的機會，命令村民拿來地券。不巧，軍醫為了宣撫，強制農民種痘，而從沒見過醫藥的內地農民，有若新開墾土地，所種的痘非常有效。於是無知的農民，以為日本要沒收他們的土地，下毒要殺他們，因此蜂擁而

起的農民羣，遂於拂曉偷襲聯隊本部，用鎗頭、農具殺了聯隊長等人。這是於一九三四年春天，在北滿土龍山發生的事情。當時，軍方公佈飯塚朝吉聯隊長是戰死，但實際上是被中國農民幹掉的。

撫順屠殺震驚世界

一九三二年十月，在撫順也曾發生過慘不忍睹的大量虐殺滿人婦女兒童的事件，惟因禁止報紙刊登，才不為人們所悉。撫順警察署來報告說，煤礦工人擅自離開工作崗位，成羣沿着路軌徒步往華北走去；而經過調查結果是，撫順守備

隊的一個上尉，以隱匿土匪，而集村莊的婦女兒童，用機槍予以掃滅。發生這個事件的稍前，日本國內的一家報紙報導說：一個「出征」滿洲的上尉太太，要她先生無後顧之憂，留下遺書自殺，該報並譽它說這是戰時婦女的典型，而這個上尉就是她的丈夫。

當時，祇有國際新聞社的奉天特派員韓達就這個事件發出電報，而韓達這個人，平素與其他外國特派員幾乎不來往，因此被誣為「哈斯特的流氓」，而沒人理他。但我猜想，這些工人抵達河北或山東時，一定會引起很大的問題；果然，

經過一個月左右，中國報紙便大登特登撫順的大虐殺事件。南京總領事館因為我的電報，當然知道其真相，可是它却反而以中國報紙報導大虐殺，而向外交部正式提出抗議。當我想及祇要不表面化，這種事最好能隱蔽過去，此種當時的心境，我真是不勝慚愧，而這種想法，才是真正害了日本。是即太平洋戰爭期間的許多屠殺事件，歸根結底，完全來自日本軍人的殘忍習性。

總之，從其誕生到她的結局，滿洲國不過是關東軍絕對支配下的偽國，而從頭到尾，她對日本既不信賴也沒有親切感。

中外文庫 之四十一 貴州政壇憶往

何輯五 著

定價台幣壹佰陸拾元

要目：貴山富水憶舊痕，清廉可風的劉顯世都督，護國討袁幕後人物王伯羣與王文華，顧祝同與西南軍政，追憶吳鼎昌主席，我對楊森將軍的認識，追念谷大哥正倫等散文多篇，另有關於貴州水資源，金屬礦產等論文多篇，篇篇可讀，更富史料價值，全書四百餘頁，穿線平裝，定價壹佰陸拾元郵撥一四〇四四號中外雜誌社帳戶。

中外文史

叢書

壯遊八十年

陳廣沅 教授著

定價平裝380元 精裝450元

本書為旅美學人名教授陳廣沅先生精心傑作要目有：唐山、上海交大生活。留學美國準備一年。二年讀書二年做工之留美生活。回國後教學生生活。服務津浦路浙贛路滇緬路回憶。赴美爭取鐵路器材。聯總救濟工作。行政院救總工作。回憶民航空運隊。避難香江十年。晚年在美教書奇聞。內容精彩，篇篇可讀。全書陸佰叁拾頁。二十五開本平裝訂價新臺幣叁佰捌拾元。精裝肆佰伍拾元，現已出書歡迎購閱郵撥一四〇四四號中外雜誌帳戶。